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邹志强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伊斯兰大国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和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生的战略依托,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双边关系、利益交汇与合作机制基础。中国应将伊斯兰大国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在现有机制之外开辟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机制,结合各自优势与需求重点,从一个区域、三个层面、八个方面构建治理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应以沿线地区为重点,以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与发展等议题为突破口,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治理实效。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全球经济治理; 伊斯兰大国; 中国

作者简介: 邹志强,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4-0033-1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正在经历重大变革,西方主导的治理理念与政策在全球与地区层面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新兴大国的治理能力与主张逐步凸显,中国已迈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时期。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展仍然缓慢,中国在“正面”推动治理变革的同时,努力寻求在现有框架外受到忽视的区域和领域从“侧面”加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可成为重要的突破口。“一带一路”倡议蕴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理论 with 案例研究”(14JJD810017)和自选项目“中东 G20 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证研究”(2014JDZDSZX002)的前期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一般课题“新时期中国参与中东地区经济治理研究”(KX171345)和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新时期东亚与中东区域大国全方位合作关系研究”(QJTD14NS001)的资助。

含着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为地区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国际公共产品与推进路径。伊斯兰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主体,倘若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积极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其治理成效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在国际体系与地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不仅为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关系注入了新的发展内涵,对改善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伊斯兰大国是指在“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国家中具有突出代表性、较强综合国力、较大国际影响力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区域性新兴大国。

一、“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互动关系

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更加关注“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对中国的动机存在诸多负面评价,^①但中国学者大都认为“一带一路”具有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可以改善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②全球经济治理也拓展了“一带一路”的功能与影响力,二者间存在紧密而不断增强的互动关系。“一带一路”集中体现了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的特点,推动中国更积极地参与乃至塑造地区经济治理,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性与话语权。

第一,“一带一路”具有丰富宏大的经济合作内涵,为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推动地区与全球经济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内涵和主要目标,同时也承载着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地缘、文化等方面的互补优势转化为务实的经济发展成果,将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各种经济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统筹,提升区域贸易、投资与金融体系的活力,密切各国经济联系,深化相互合作,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由此,中国依托自身的经济实力可以成为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与稳定锚,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和中国崛起对欧亚大陆众多经济转型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③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大国、贸易大国、投

^① Theresa Fallon, “The New Silk Road: Xi Jinping’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7, No. 3, pp. 140-147.

^② 毛艳华《“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与贡献》载《人民论坛》2015年3月下,第31页;王文、刘英《“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6期,第57页;王明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6期,第77页。

^③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第17页。

资大国,经济实力与影响力日益显著,也有能力成为沿线国家的出口消费市场与投资者,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其市场、资金与技术需求。“一带一路”顺应了沿线国家的内在需求,为促进沿线区域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贸易投资成本以及边远地区开发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①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带一路”通过在基础设施、贸易、能源、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进一步将沿线国家的经济连接起来,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把原有碎片化状态下各自孤立的国家与更广阔区域相联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与联动,增强了沿线国家的外在与自主驱动能力。

第二,“一带一路”搭建了多样化的经济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进入新的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调整结构与治理改革等方面也有着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型的国际区域合作平台,并重点围绕“五通”搭平台、建机制,实现多层次、多领域互联互通的目的,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与经济融合。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资金融通是保障,^②其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优势相契合并能有效对接。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加大货币互换、创建新的投融资机制提供资金保障,为沿线地区国家形成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助力。“一带一路”包含大量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项目,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先导,建立涵盖广泛、内容丰富的能源、贸易、投融资机制,以多种平台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和优势互补,为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也构建了联合相关国家共同开展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立体框架,以平台和机制创新为地区经济合作提供制度驱动,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对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参与广度和深度。中国可建立“一带一路”区域内的经济协调机构,发展完善以亚投行为基础的金融治理架构,建立沿线多层次贸易结构,开辟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区域,构建国际经济治理的新路径。^③

第三,“一带一路”体现新的经济合作理念,为新时期的地区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中国致力于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包容性发展,倡议打造“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为当代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倡导通过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整合,建立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不搞封闭式

① 卫志民《“一带一路”战略:内在逻辑、难点突破与路径选择》载《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第109页。

② 王宛、成志杰《“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内涵与外交布局》载《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4期,第4页。

③ 赵建春《中国国际经济治理权构建的路径研究》载《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8期,第8页。

的同盟体系,对所有相关国家开放,并惠及所有参与国的建设过程,通过共享改革发展经验为沿线国家经济改革与体制变迁提供新的推动力。中国充分重视和尊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体作用,尊重彼此的战略需求及考虑,强调共同治理和互动治理。^①与此同时,中国一贯尊重他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将他国发展当作自身机遇,倡导互利共赢,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我赢你输的“零和模式”。“一带一路”可推动共同利益的聚合,促进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助推地区经济合作,为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合作提供新模式。面对共同的经济发展障碍、转型难题、贫困与失业等现实问题,“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中国和沿线各国积极应对共同挑战、协同发展、优化地区治理的有益探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体的合作项目与经济利益使得中国倡导的理念具有了坚实的支撑,中国参与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也变得日益生动和具体。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沿线国家实现转型发展,从稳定区域的角度来看,促进区内各国的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是解决区域问题的最好出路。^②

第四,“一带一路”有助于为沿线地区经济治理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形成新的地区经济秩序。当前,国际公共产品出现供应失衡和不足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尤为显著,而“一带一路”可为沿线地区提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崛起中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并且有能力和意愿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肩负起更大责任。^③中国欢迎周边或相关国家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改善因美日欧经济停滞所导致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不足,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④“一带一路”聚焦互联互通和融资平台的建设,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一定程度上为沿线地区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在提供新型国际合作理念与模式、高效的设施互联互通、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和消除动荡根源等方面增加了全球公共物品供给。^⑤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打造地区间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跨国公共基础设施、能源通道、贸易平台和投融资机制等,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开放式平台与合作机制。例如在能源领域,达成公正的能源交易规则和定价机制,形成和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机制,无疑将有助于建

① 杨思灵《“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关系治理及挑战》,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28页。

② 赵菡茵《“一带一路”与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走向》,载《人民论坛》2015年第6期中,第233页。

③ Gerald Chan, Pak K. Lee and Lai-Ha Chan, *China Engages Global Governance: A New World Order in the Mak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4.

④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第139页。

⑤ 涂永红等《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载《理论视野》2015年第6期,第65页。

立国际能源新秩序。^①“一带一路”提供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的地区间合作平台,对于深陷发展困境与相互合作层次较低的沿线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有利于提升地区国家经济活力与相互间合作水平,也必将对地区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二、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基础

伊斯兰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相似,在争取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双方有巨大的共同利益。^②在“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互动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沿线大国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伊斯兰大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战略支点国家,不仅是中国积极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新生合作力量,而中国与伊斯兰大国之间也存在较为坚实的治理合作基础。

第一,伊斯兰大国是“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和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

伊斯兰国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成员甚至是主体部分,特别是东南亚、中亚、南亚与中东^③四大关键地区,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对于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④的丝路构想至关重要。在上述四个关键地区的41个国家中,伊斯兰国家占了27个;而在沿线众多伊斯兰国家中,以印尼、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哈萨克斯坦与巴基斯坦等为代表的伊斯兰大国具有突出代表性和较强综合国力,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与战略支点国家。上述七个伊斯兰大国的人口总数超过7.3亿,2014年经济规模超过3.6万亿美元,^⑤是沿线伊斯兰国家与所在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除土耳其、巴基斯坦外其他五国均是能源资源大国,2014年石油总储量达到4.621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27.2%;石油日产量达到1.836万桶,占世界的20.7%;天然气储量达到49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26.2%。^⑥伊斯兰大国是中国重要的能源来源地与贸易投资伙伴,2014年

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CIIS 研究报告《推进“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外交运筹》2014年第7期,第8页。

② 刘正茂《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伊斯兰国家经济政策分析》,载《天府新论》2011年第6期,第67页。

③ 此处的中东不包括埃及之外的其他北非国家,与中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一致。

④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⑤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 登录时间: 2016年4月20日。

⑥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5, BP Global,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5/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5-full-report.pdf>, 登录时间: 2016年1月2日。

中国从上述五国进口石油达到 8 415.45 万吨,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 27.3%;^①同年中国与七个伊斯兰大国的贸易总额达到 2 576 亿美元,占中国与 27 个伊斯兰国家贸易总额的近 40%,中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②中国对上述伊斯兰大国的直接投资也正在稳步上升,2014 年对七国的投资存量总额超过 250 亿美元。^③

伊斯兰大国也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关键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沿线伊斯兰地区经济面临复杂艰巨的诸多挑战,“治理赤字”突出,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存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环境脆弱、基础设施滞后、人口增长过快、贫富分化严重、就业等民生压力巨大等问题,并受到地区冲突、大国争夺、恐怖主义等因素的持续冲击。中东国家和巴基斯坦均面临经济发展与安全困境的双重治理挑战。^④而政治安全困境往往与经济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真正解决地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难题、实现可持续增长并惠及民生才能使中东国家逐步走出政治安全困境。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东动荡,根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⑤新时期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化联系与双向互动不断增强,对沿线地区经济事务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国内外对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与压力也不断增大,积极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具有必然性。在建设“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进程中,中国需要将自身的经济实力与沿线国家的支持结合起来,共同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进程。伊斯兰大国是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关键合作伙伴,这也与其希望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目标相一致。

第二,伊斯兰大国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生合作力量与战略借重力量。

“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大国均是有突出代表性、丰富资源与战略地位、较强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全球经济及世界大国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国家,是影响全球经济治理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伊斯兰大国作为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在所在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拥有较大影响力,并抱有成为世界大国和发挥更大影响的国际抱负。如印尼的地区大国身份与中等强国身份形成了相互促进的效果,在地区事务中拥有领导地位,在全球多边组织中保有稳固席位。^⑥伊斯兰大国多实行多元化的外

① 田春荣《2014 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状况分析》载《国际石油经济》2015 年第 3 期,第 60-61 页。

② 《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14 年 1-12 月)》载《国际贸易》2015 年第 2 期,第 70 页。

③ 中国商务部《201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3-52 页。

④ Claude Georges Pierre Pakisits, “Pakistan’s Twin Interrelated Challeng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6, No. 2, 2012, p. 139.

⑤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2016 年 1 月 21 日,开罗)载《人民日报》2016 年 1 月 22 日,第 3 版。

⑥ 李峰、郑先武《区域大国与区域秩序建构》载《当代亚太》2015 年第 3 期,第 61 页。

交政策,与外部大国及在全球治理网络中存在多元化的联系,这也为其参与国际事务赢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伊斯兰大国在自身丰富资源的基础上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和雄厚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影响全球市场的重要因素;而具有深厚文明底蕴的伊斯兰特色经济形式也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一种参考与借鉴。如伊斯兰金融与西方现代国际金融运行模式有着重大区别,2008年后成为全球金融风暴肆虐下的安全“方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①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以美欧日为代表的西方大国显露颓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已然崛起,伊斯兰大国也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力量。伊斯兰大国被认为是当前随着国内改革与国际体系变化崛起的新兴大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印尼“国内转型加强了其国家实力与国际形象,而国际体系变化提供了其地区与全球崛起的机遇”^②;土耳其寻求与金砖国家中的新兴大国建立新的联盟,双方都将推动进入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时代作为重要目标;^③伊朗拥有崛起为地区性领袖国家的潜质,现阶段正在实现“自主性”地区崛起。^④其他几个伊斯兰大国也表现出类似特点。伊斯兰大国的身份和地位虽然不如金砖国家瞩目,但重要性正日益凸显,并在G20中占有三个席位(印尼、沙特、土耳其),G20机制化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也提升了伊斯兰大国的影响力。从国家实力、合作基础与治理权力等方面来看,伊斯兰大国拥有诸多独特优势与条件,在各自地区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可以释放出更大能量。总体来看,伊斯兰大国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持积极态度,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与变革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新时期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伊斯兰大国群体更大程度的积极参与。同时,伊斯兰大国与中国之间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契合各国希望发挥更大国际影响、成为全球大国的抱负,将有力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发展,进一步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的力量格局。因此,伊斯兰大国可以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生合作力量与战略合作力量,双方加强治理合作有助于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伊斯兰国家特色领域层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并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

第三,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双边关系、利益交

① 邹志强《沙特阿拉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228页。

② Vibhanshu Shekhar, *Indonesia's Rise: Seeking Regional and Global Roles*,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nd Pentagon Press, 2015, p. 23.

③ Aylin Guzel, "Turkey's Rol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layer and its Power Capacity: Turkey's Engagement with other Emerging States," *Review of Sociology Politics*, Vol. 22, No. 50, p. 103.

④ 王恩学《试论伊朗的“自主性”地区崛起》,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4年第1期,第80页。

汇与合作机制基础。

首先,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国情与发展目标相近,政治关系普遍良好,经济联系十分紧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始终具有战略意蕴,相互理解和尊重的政治关系始终是双边关系的主流,并经历了从双边到多边,以政治领域为主向经贸、能源、安全、文化等多领域逐步拓展推进的过程。^①中国与伊斯兰大国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面临着类似的发展任务与目标,均建立了战略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经济互补性强,贸易联系紧密,是理想的经贸合作伙伴。伊斯兰大国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群体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中国也成为伊斯兰大国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能源出口市场的重心、石油美元新的投资场所,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也日益引起伊斯兰国家的普遍重视。

其次,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利益诉求相似,共同面临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压力与机遇。在金砖国家之外存在着第二类新兴大国,即土耳其等“近金砖国家”(near-BRIC countries),近年来积极影响地区权力政治平衡,在国际组织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②伊斯兰大国作为新兴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提高国际经济地位,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优先关注和能够发挥作用的议题具有共通性。从实践议题来看,它们主要关注全球经济复苏、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稳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关注发展中国家权益等。如印尼在 G20 中的主要诉求是推动落实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优化国际金融秩序、强化金融体系监管等,并希望提升东盟的地位。^③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在营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全球经济规则变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等方面利益交汇、诉求相通、政策相近,具有良好合作基础,也正是多领域的利益交叉融合使伊斯兰大国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强了全球经济协调合作。

最后,“一带一路”为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与平台。“一带一路”为地区和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国际公共产品与参与路径;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治理合作可推动双方成为沿线地区治理的参与者甚至是“塑造者”,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提升双方治理能力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自身发展需求与外部治理诉求共同构成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

^① 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9 期,第 4 页。

^② Ziya Önişand and Mustafa Kutlay, “Rising Power in a Changing Global Ord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urkey in the Age of BRIC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No. 8, 2013, p. 1409.

^③ 徐凡《G20 全球经济治理与穆斯林世界——印尼视域下的国际关系基础》,载《亚太经济》2015 年第 2 期,第 19 页。

作的重要基础。目前,中国与上述伊斯兰大国均已签订了关于共建“一带一路”或开展相关战略对接的政府间合作协议,如“一带一路”与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写入了2015年3月发布的《中国与印尼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东三个伊斯兰大国(沙特、埃及、伊朗)时,均签署了相关共建协议等。

作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大国,中国需要伊斯兰大国对自身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顺利举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供支持。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与机构改革、全球能源治理、全球发展治理以及维护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等方面应积极争取伊斯兰大国的协助与支持,加强在伊斯兰地区推进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地区经济治理合作,提升在G20等机制内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三、关于加强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建议

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进入关键阶段和中国加大全球经济治理参与力度的背景下,不断扩大治理合作的“朋友圈”,开拓治理合作的新领域与新舞台,对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提升中国的治理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除全球层面的治理参与战略外,中国应加强战略筹划和战略布局,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要有所作为。^①中国应重视伊斯兰大国在地区和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致力于构建新型治理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推进治理合作的新路径。

第一,将伊斯兰大国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与借重力量。

当前,伊斯兰国家经济与外部世界的联动日益紧密,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涉及能源、贸易、金融、投资、区域经济合作、全球发展援助等诸多领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系统重要性;呈现出多渠道、双向性的互动联系,不再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无关紧要的边缘地带。作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经济体,上述七个伊斯兰大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表现与作为也决定了伊斯兰国家与全球经济的互动关系及其未来。正如在政治安全领域必须重视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一样,在经济领域也日益无法忽视伊斯兰国家的重要地位。伊斯兰国家地位重要且处于大国中间地带,治理难题突出,是当今全球治理的难点之一,也是考验世界大国全球治理能力与大国关系走向的关键地区,各个世界大国日益重视并加大了对伊斯兰地区经济治理的参

^①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未来10~15年》,载《改革》2014年第5期,第66页。

与力度。^① 因此,有必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认识伊斯兰大国的经济重要性,深入研究伊斯兰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大国的崛起深刻影响着伊斯兰大国的经济表现与对外经济关系,伊斯兰大国也加大了“向东看”的政策力度,这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契合,使得它们在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的地位也更加凸显。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可根据双方的治理诉求与现实能力,在能源、贸易、投资、区域经济发展、石油美元、亚投行、G20 等议题上发挥独特的作用;而合作重点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能源、贸易、发展等领域,构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治理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进程、地区经济治理、双边关系、大国关系将产生多重影响,有助于探索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的新路径,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从区域到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强调发展优先、民生为本、伙伴关系、渐进式与本土化治理等,突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特色与贡献。

第二 加强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机制建设。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应结合各自的优势与需求,重点从一个区域、三个层面、八个方面构建治理合作机制,分层次、有重点地提升合作水平。

首先,从重点区域来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开展全球经济治理合作首先应定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特别是伊斯兰大国能够发挥直接影响的伊斯兰世界。应将推动伊斯兰地区经济治理作为双方治理合作的首要任务,这既是地区国家的发展需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发挥效力的关键。应着力解决沿线伊斯兰地区的经济发展难题,提供地区经济治理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地区国家经济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探索合作参与地区经济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其次,从组织平台来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应考虑在伊斯兰特色经济体系、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架构、新兴国家主导的经济平台三个层面提升合作,加强与西方大国间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协调互动。当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合作对象主要是以 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相应地在合作的组织平台上主要表现为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架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和新兴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艰难、原有机制无法反映中国的地位与话语权的情况下,中国也逐步考虑建立自主性的新兴经济治理平台(如亚投行)。能源、石油美元、主权财富基金、伊斯兰金融等具有伊斯兰特色的经济体系与机制为中国充实治理合作力量和平台提供了新的依托,而中

^① 邹志强《“一带一路”背景下沙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86 页。

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应注重加强双方在中国主导的新兴经济平台上的合作,并注意和中国与西方大国合作机制、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之间的协调互动,形成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良性互动局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倒逼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①对中国与伊斯兰大国之间建立合作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最后,从合作机制来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合作进程中应注重加强战略对接、利益融合、政策协调、领域选择、议程设置、组织创建、规则塑造与风险防范等八个方面的机制建设。加强与伊斯兰大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与利益融合是基础,如印尼的“全球海上支点”战略、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战略、土耳其的建国百年目标等。在积极寻求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加强经济政策与治理议题的协调沟通,在地区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选择双方拥有共同利益诉求和现实基础的优先领域进行重点合作,注重议程设置与组织创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创建新的国际和地区多边治理平台,以更为机制化的方式开展合作治理,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转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治理合作受到多重因素的动态影响,还面临不少制约和挑战,在合作实践中应注意伊斯兰大国身上表现出的复杂与模糊的政策倾向。例如,国际身份与外交政策定位使土耳其等国的全球经济治理政策具有复杂性与模糊性,既表现出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特征,又有与域外西方大国保持政策一致性的外在约束。^②

第三 选择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全球经济治理合作的最佳路径。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治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在契机、理念、议题与机制等方面对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治理合作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契合中国与沿线伊斯兰大国的发展需要和相互优势,为双方提供了共同参与地区经济治理的契机,而以互利共赢为特色的新型合作理念、以“五通”为主要内容的议题设置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网络化合作机制必将推动中国与沿线伊斯兰大国的合作治理实效。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应以沿线地区为重点,以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与发展等议题为突破口,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治理实效。针对伊斯兰大国的经济特点、主要诉求与影响力,双方的治理合作应立足于沿线地区,共同构建基础设施网络化合作机制与新型发展援助体系,发挥各自在资源、市场、资

^① 王厚双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机制创新的影响》,载《亚太经济》2015年第3期,第3页。

^② 邹志强《土耳其与二十国集团:角色、认知与政策特点》,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第23页。

金、产能、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推动更为平衡、自主、互利、共赢的地区经济治理模式。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应是“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上支点”战略对接的核心领域,^①这对于其他伊斯兰大国来说也是如此。中国应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治理路径为基础,致力于提高治理实效,扩大在地区治理议程上的影响力,进而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性与话语权。相信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治理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展的互动模式将对今后的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四、结语

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着许多内在困境,超越困境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各种跨地区经济治理、地区经济治理、双边经济治理以及内部经济治理形成多层覆盖、议题聚联、务实高效的复合型治理网络。^②同时,在重视地区经济治理的同时,也应跳出传统单一的地区范畴,致力于更为广阔的地区,通过一定的主线动员与整合,拓展新时期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空间。在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进程中,应有意识地将“一带一路”、伊斯兰大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三者结合起来,进而将沿线多个地区有机串联起来,丰富对全球经济治理与“一带一路”互动关系的认知与研究;拓展“一带一路”的实践内涵与合作力量,在其框架下提升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深化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增强对伊斯兰地区经济事务的影响与塑造能力,维护日益扩大的海外利益,也回应西方对中国“搭便车”的指责;将伊斯兰大国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培育和塑造新的战略借重力量,开辟新的治理合作机制,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话语权。

(责任编辑:李 意)

^① 马博《“一带一路”与印尼“全球海上支点”的战略对接研究》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第44页。

^② 宋国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及超越》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第23、28页。